

村寨

錫

伯族

辽宁沈阳市新民村调查

主 编：王 皎
江 帆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



辽宁大学出版社




伯族

辽宁沈阳市新民村调查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

主编：王 皎
江 帆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锡伯族：辽宁沈阳市新民村调查/王皎，江帆主编。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高发元主编)
ISBN 7-81068-786-7

I. 锡... II. ①王...②江... III. 锡伯族—居住区—调查报告—沈阳市 IV. K28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5916 号

锡伯族——辽宁省沈阳市新民村调查

主 编：王 皎 江 帆

责任编辑：龙宝珍
责任校对：宋 武
装帧设计：刘 雨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875
插 页：8
字 数：278 千
版 次：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68-786-7/C·69
定 价 23.00 元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云南大学英华园（邮编：650091）
电 话：0871-5031071
E-mail: market@ynup.com
传 真：0871-5162823

总 序

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 高发元

1956年~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万字的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搜集与积累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基础材料。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无论是进行决策的党政部门，还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界，要深入进行民族调查的愿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现状，深入探讨少

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地把握少数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制定出适合于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

如何在新的时期开展民族调查，以获得开拓性的成果，这就不能囿于传统的民族调查方式，而必须有新的观念、新的方式。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说，分化与整合，是当代学术研究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方面，各个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日益分化的趋势，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学科之间的整合趋势，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其界限越来越模糊，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不断增多。

民族学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民族共同体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又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包含着语言、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子系统。因而民族学不能仅关注民族的某一局部，必须关注民族的各个方面、整个系统。为此，“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一般都要花费许多时间与人类学以外的专家共同研究。这些时间超过与在其他在野外方面的人类学家磋商的时间。”^①这就是说，如果要对民族的各个方面完整系统地作深入调查研究，仅靠民族学自身特有的理论和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民族和文化的领域十分广阔，单靠民族学的专门化已无法驾驭层出不穷的新的重大课题，这就要借助于其他学科。任何一个民族学工作者都不可能掌握全面的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这就要求民族学运用整体论的观点，打破学科封闭，与其他学科交叉协作，进行综合调查研究。”^②民族调查与研究的实践和历史充分证明，民族学必

^① F. 普洛格、D.G. 贝茨著，吴爱明译：《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第1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16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须经常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才有可能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取得较快的进展与重大的突破，从而不断进步与发展。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继 2000 年组织对云南省人口在 5 000 人以上的 25 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查后^①，2003 年 7 月 ~ 8 月又组织了对全国 32 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与在云南进行的调查一样，全国的民族村寨调查采取了一个“深入”、两个“综合”的方式。一个“深入”，即不对每个民族做广泛的面上的调查，而是每个民族各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村寨，在这一个点上进行深入调查。两个“综合”，一是调查内容的综合，即对每个民族村寨都进行人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法律、婚姻家庭、宗教、科技、卫生、教育、生态等诸方面的综合调查。二是调查人员的学科综合。在这次调查与研究过程中，除了一部分民族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外，大部分调查人员和研究人员来自云南大学和全国 15 个省区有关大学、科研单位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涵盖了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档案学、管理学、人口学、旅游学、语言学、艺术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还有一部分自然科学方面如生态学、遗传学、建筑学的人员参与，并专门进行了遗传信息方面的调查。整个调查工作涉及到的总人数为 203 人，其中云南大学的师生 105 人，其他省区 98 人。调查人员中，教师和科研人员 110 人，占 54%（教授 32 人，副教授 40 人，讲师 31 人，高职人员共 72 人，占总人数的 66%）；干部 11 人，占 6%；学生（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82 人，占 40%。调查队伍

^① 调查由云南大学的 142 名师生完成，形成了 25 本调查资料、1 本专题研究报告、1 本画册，已由云南大学出版社于 2001 年出版。此外，还拍摄录制了一批录音带、录像带、照片，采集了云南少数民族 1 300 多人的血样，建立了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库。

以中青年为主，其中45岁以下170人，占总人数的84%。

经过周密部署和精心组织，此次调查虽然历时不长，但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

1. 作为云南大学建校80年来第一次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族调查，接触到了省外各民族的习俗和风情，开阔了视野，为云南大学民族学重点学科的建设 and 上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与国内相关省区建立起了密切的学术联系，为以后的民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省外32个调查点可以成为云南大学今后长期合作研究的基地。

2. 积累了跨省区、跨校合作开展田野调查和进行研究的经验。诚如民族学界所指出的：“大规模的综合调查不是少数人所能承担的，组织协调也比较复杂、困难。”^① 这次调查的32个少数民族村寨，分布在全国15个省区，地域非常广阔，仅靠云南大学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因此，这次调查突破了一般传统，与所调查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合作，分工完成。15个省区的41所大学、科研单位、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参与了由云南大学组织的调查和文稿撰写工作。其中，台湾佛光大学承担了台湾高山族（泰雅人）的调查，开了该校与大陆合作进行民族田野调查的先河。

3. 此次调查以多学科的形式合作配合，交叉渗透，对于民族调查工作来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比如在此次调查中，加入了体质健康调查小组，仅用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31个民族（不包括台湾泰雅人）约1500多份血样的采集，也搜集到了部分实物。这样，调查工作就为云南大学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库建设、博物馆建设等创造了一定条件。

^①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166页。

4. 此次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文字、音像资料，大部分为第一手资料，为调查资料的整理、写作以及专题研究提供了条件，也弥补了过去有关民族调查中调查手段或内容单一的不足。共形成了32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资料32本，文字总量1000余万字；形成了民族生态、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婚姻家庭、文化、风俗习惯、教育、科技、卫生、宗教13个专题研究报告，文字总量约为30万字；1本调查工作实录28万字。此外，32个民族调查组均拍摄了大量照片，内容包括生态环境、生产工具、生活场景、文化习俗、宗教活动等各个方面，照片总量达10000余张。许多调查组运用了影视人类学的方法，拍摄了近百盘录像带。有些调查组对民族语言、民歌、民谣等进行了录音，带回一批录音带。

5. 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作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族学必然要以田野工作为其研究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法。可以说，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在调查过程中，各调查组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障碍，磨炼了调查人员特别是学生的意志，运用与深化了所学的理论知识，掌握了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在实践中锻炼了思想品德，增长了才干。同时一批新的人才加入到民族研究的队伍中来，增强了民族研究的力量。

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规模如此浩大的民族调查，问题和不足在所难免。如有的调查人员缺乏调查经验，有的调查还比较粗糙。从总体上看，各本调查资料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并不完全一致，有高低、深浅之分；从每一本调查资料来看，各部分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也不完全一致，也有高低、深浅之别。这大概是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众手成书情况下都不可避免的问题。

现在，我们把32个民族村寨的调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专题研究报告整理出来公开出版，是因为这些成果真实地记录了现在时段这些民族村寨的全貌，是第一手的最新资料，相信会有现实的参考价值和历史的保存价值。其中调查工作的实录，比较具体完整地反映了这次工作的整个情况，相信也是有意义的。

民族调查是一项长远的宏伟的工程，这次的成果也仍然只是我们的一个起点，我们的工作还会长久地进行下去。诚恳地希望一切关心民族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的同仁给我们批评，指正，使这一幼苗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2004年5月

前 言

锡伯族是中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鲜卑的后裔。他们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保留着鲜卑文化的少数民族。

翻开锡伯族的历史，悲壮与豪迈、蹉跎与执著伴随着古鲜卑人的足迹，从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的蛮荒与神秘，走向盛京的繁荣与文明。百年驻防，万里西迁，这个骁勇强悍的民族，同中华民族的发展荣辱与共、沧桑砥砺，世代代为守卫祖国边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令人赞叹和敬仰！

走进锡伯族的现实生活，骑射民族的遗风犹存，而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特别是在沈阳市新城子区兴隆台锡伯族镇新民村——这个锡伯族聚居的东北小村庄里，到处可见科学技术改造的痕迹，散溢着信息时代新农村特有的泥土芳香，这多么令人欣喜！然而，更值得高兴的是，在这块传统的根基被深深埋藏的土地上，我们还是挖掘出了一些尚未失踪的民族文化的遗珍。于是，我们既如获至宝般的激动，又为传统文化的烁珠彩贝被现代化浪潮冲击得褪色销蚀而扼腕痛惜。2003年夏秋之际，我们对新民村锡伯族的调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复杂的心情下开始的。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课题，却是一个紧迫而有意义的课题。

辽沈地区是我国锡伯族的重要聚居地，而沈阳市新城子区兴隆台锡伯族镇是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镇。新民村位于兴隆台

镇东部，现有人口1 274人，其中锡伯族1 020人，占全村人口总数的80.06%。除了锡伯族外，新民村还有朝鲜族、满族和蒙古族，是一个以锡伯族为主，多民族杂居的村落。历史上，新民村曾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也经历过“十年九涝”的灾难。值得庆幸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帮助下改洼治涝，改良土壤，尤其是改旱地开发水田，大面积种植水稻，使新民村的粮食产量大大提高。计划经济时代，新民村是经济发展较快、较好的民族农村的典型。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民的生活水平又有了较大的提高，彻底改变了锡伯族群众贫困落后的面貌。改革开放以来，新民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部分锡伯族人家住上了砖瓦新房，电话、电视已普及，摩托车、汽车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九年制义务教育得到普及。2002年，新民村人均纯收入达3 711元，成为一个准少数民族“小康村”。

我们本次对辽宁锡伯族的调查，之所以选择新民村作为调查点，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辽宁省的锡伯族主要分布在沈阳市北郊，而又以新城子区较为集中。新城子区的兴隆台镇作为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镇，素有“锡伯之乡”的称誉，锡伯族人口较多，有着醇厚浓郁的锡伯民俗风情。

第二，新民村是一个较典型的锡伯族聚居的村子。在兴隆台镇下辖的17个行政村中，新民村建村历史悠久，锡伯族人口多且血统较纯正。

第三，新民村的经济程度在整个沈阳锡伯族中处于中上水平，具有代表性。它既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典范，又是改革开放后阔步前进的新农村。选择新民这样的村子作为调查点，有利于比较生动地展示锡伯族社会发展变化的面貌，对于少数民族村寨现状的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新民村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完整而丰富的文化变迁的经历。时至今日，我们在新民村还能看到一些锡伯族古老传统与文化的遗迹。新民村的中老年人对本民族的历史和风俗习惯都了解，尤其可贵的是，不同时期的文化形态在新民村都存在或发生过，还没有退出人们的生活，有的还没有退出人们的记忆。例如新民村的宗教信仰内容十分丰富，原始宗教、佛教、基督教同时并存，这当中既保留了锡伯族最古老的祖先崇拜，又有现代外来宗教的长驱直入，它们各成体系、相互独立而跨越时间空间并立并信，为我们研究锡伯族的宗教文化及其变迁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我们把锡伯族的调查点选在新民村，立足在一个坚实而高远的平台上来审视历史与传统，有利于我们从容客观地面对现实，从而正确把握这次对于民族村寨现状的调查。

锡伯族调查组的成员共有 6 位。组长由云南大学的王皎老师和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的江帆老师共同担任。在组员当中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沈阳市锡伯族联谊会理事长、锡伯族学者关宝学先生参加。另外三位组员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詹娜，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杨胤宁以及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工作系四年级学生方劲。调查组成员来自于不同的地区、单位和专业，在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上都具有互补的优势。本次调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并按时完成任务，是全体成员团结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果。

调查组于 2003 年 7 月 18 日离昆赴辽宁，在沈阳市和兴隆台镇受到了市民委和镇政府的欢迎和大力帮助，于 7 月 23 日正式进入新民村，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在新民村期间，调查组成员住在农户家中，与锡伯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娱乐，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在村干部和村民们的配合下，调查组对新民村锡伯族

的历史、人口、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婚姻家庭、文化、风俗、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获得了一些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工作进展很快。

在调查方法上，我们吸取了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田野工作的一些方法和经验，取长补短、互为补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具体来看，主要采用了以下方法：一是参与观察。正因为调查组成员融入到了锡伯族群众的生活中，共同参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各项事务，如每天晚上与村中小乐队同娱乐，参加基督教的礼拜等等，能够零距离地观察到各方面的情况，从而获取我们所需要的素材，或者发现问题和思路。二是召开座谈会。我们在新民村组织村干部、村中老人、普通村民召开了不同主题和规模的若干个座谈会，就我们需要和感兴趣的问题较为直接和集中地向锡伯族群众了解情况。新民村户数较多，入户访谈的工作量太大，而召开座谈会方便快捷且针对性强，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调查方法。三是访谈。访谈又有几种情况：入户访谈、追踪访谈、深度访谈。这是我们在新民村调查期间使用得最多最重要的方法。尤其是追踪访谈和深度访谈，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对于一个问题的调查，不是一次两次、一天两天就能搞清楚的，往往在得到一点线索后必须紧追不放，顺藤摸瓜；而对于一些较为复杂或模糊不清的问题，则非要打破砂锅问（纹）到底不可，这直接影响到整个调查的深度和质量，因而深度访谈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了。四是问卷和表格调查。面对内容多、范围广的这样一次调查，我们要求每位成员在调查前，结合自己调查的内容和任务，设计一些方便适用的表格和问卷，便于在调查前理清思路和调查后进行统计和分析。五是录音、摄影和摄像。借助现代化的手段和工具来协助田野调查工作，对于原始资料的搜集、保存和整理都十分有益。

除此之外，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们还采用“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方式，在内容、程序和节奏上对整个调查进行安排和控制。即调查之前先了解情况、收集资料，做一些面上的工作；调查中在具体的内容和专题上，亦即在某一点上发现问题和重点时，及时返回到面上来查找背景材料，寻求更宽的调查领域，拓宽思路；最后当点上的调查基本结束之后，再次返回到面上来总观全局，查遗补缺。这样一来，能做到点面兼顾，有效地避免“细而不全”或点面分离、材料零散的情况，还能尽量减少残缺与遗漏，并且很好地控制了整个调查的节奏，使调查工作灵活而有序。

调查过程中还有个情况值得一提。历史上新民村曾建有一个喇嘛庙——千佛寺，至今地方史料中还有“俸天城北千佛寺”的记载，是当时盛极一时的佛教圣地，由此极大地活跃了新民村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20世纪50年代，千佛寺被扒除，今天仅留下一口百年老钟。调查组在新民村工作期间，经常听到千佛寺的故事，村民们对千佛寺及村中那段历史满怀深深的眷恋与惋惜，特别是老一辈的锡伯族群众到处奔走呼吁修复旧庙，这简直已经成为他们的一块心病。在新民村的每一天，我们都为村民们这种难以释怀的宗教情结所感染和感动。特别是调查组一行人刚进村时，大家误以为是修庙的考察人员来了，常常追随着我们询问有关修庙的事，在他们眼神中平添了几多希望与光彩。一时间，修庙成为新民村男女老少茶余饭后最主要的话题。在经过多次的解释以后，村民们才明白了我们的身份，他们有的失望了，有的则转而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期盼着我们也能助一臂之力，这不由得使我们的心情沉重起来，也引发了我们更深的思考。在新民村，除了老人们口耳相传的记忆外，并没有其他记录千佛寺的资料，庙中的文物更是几经破坏，早已不知去向。看来，要恢复千佛寺原貌，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在新民村，像千佛寺一样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民族文化现象还不止其一，它们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流逝，这就提醒我们要重视对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研究。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课题，却是一个紧迫而有意义的课题。

带着沉甸甸的收获和沉甸甸的思索，我们结束了这一阶段在新民村的调查工作。我们把这些所得所思都写进了书稿中，汇编成眼前这本 20 余万字资料。然而，我们的思考并没有终止，我们的工作还在继续。在离开新民村前，调查组把一块“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锡伯族调查点”的匾挂在了村委会的墙上，从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这只是我们调查研究工作的起点，是我们和锡伯族同胞缔结友谊的开始，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我们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概况与历史	(1)
第一节 自然状况	(1)
第二节 族系源流	(4)
一、族名	(4)
二、鲜卑——锡伯族的祖先	(5)
三、编旗驻防	(7)
第三节 建村及沿革	(13)
一、村名来历	(13)
二、建制沿革	(16)
第二章 人 口	(18)
第一节 民族构成与人口变动	(18)
第二节 人口的自然状况	(19)
一、性别状况	(19)
二、年龄状况	(20)
第三节 人口的素质状况	(22)
一、健康状况	(22)
二、文化素质	(24)
第四节 人口的行业、职业结构	(25)
第五节 人口的生育与死亡状况	(26)

一、生育状况	(26)
二、死亡状况	(29)
第六节 人口的迁移流动情况	(30)
第七节 计划生育工作	(32)
一、区内计划生育政策及规定	(32)
二、节育人数、节育方式及节育率	(37)
三、计划内、计划外生育情况	(38)
四、计划生育统计中的孩次比例和性别状况	(39)
五、计划生育经费投入情况	(40)
第八节 人口与发展	(41)
一、人口对资源的占有情况	(41)
二、人口的收入情况	(42)
三、人口发展的老龄化趋势	(43)
四、人口与发展中的其他问题	(44)
第三章 经 济	(46)
第一节 原始形态的渔猎经济	(46)
第二节 南迁盛京后的经济生活	(50)
第三节 民主改革时期的经济状况	(53)
第四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状况	(55)
第五节 “旱改水”：新民村锡伯族经济生产 的一次革命	(57)
第六节 其他产业经济状况	(61)
一、副业	(62)
二、手工业	(63)
三、商业贸易	(64)
第七节 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66)
第四章 社会政治	(69)
第一节 传统社会组织形式	(69)